



TANGSONG KEJU ZHIDU YANJIU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

陈秀宏◎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学
辽宁大学国家级项目

(11LDGY19)



TANGSONG KEJU ZHIDU YANJIU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

陈秀宏◎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 / 陈秀宏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303-14201-9

I. ①唐… II. ①陈…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D6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46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9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滕飞飞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要的制度，长久以来非但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群体心理都有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及其趋势亦有较重大的影响。对科举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传统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而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不仅奠定了其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基础，而且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亦有较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士阶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四民”之首，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整个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价的巨大影响，而且又是一个肩负文化继承、匡世济时等诸多历史使命的一个无法替代的社会阶层，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自科举制度行世之后，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命运便同科举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该书将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士阶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力图从唐宋科举制度的嬗变与士阶层的变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来揭示隐藏其表象背后的中国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刻的内涵。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独具匠心的视角，以及勇于创新的气魄，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与较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该书是作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在拥有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前期成果基础上，以及注重历史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相结合，注重继承前人成果与独立创新相结合，注重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等特色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使得该书不仅具有历史的凝重、厚实，而且又具有视野的开阔，见识的深刻。书中各种图表的绘制以及关于覆试与殿试的考辨，尤见功力。

总之，该书选题视角别致，立论准确，论述充分，材料翔实，结构谨严，

脉络清晰，表述准确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和秀宏相识已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秀宏还是一个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在我的课堂上，我给他上了大学的第一堂《中国古代史》课，后来我又给他上过《中国史学史》课，在课上课下，我们逐渐有了不少的接触，我知道秀宏是个知识面很宽、很喜欢历史与学术的人，更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思想的人，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当时正处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下，有这样志向的学生是不多的。大三的时候，他曾就毕业论文的事征询我的意见，我知道他对唐史很感兴趣，于是在我的启发下，选定了《中晚唐世风嬗变述论》的论文题目，并顺利通过答辩。

毕业后，秀宏去大学当了老师，他获得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两年后，他又考取了著名学者、唐史专家任爽先生的研究生，连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接受了成为学者的最基本而系统的训练过程。我参加了他的两次毕业答辩，切身感受到十余年来秀宏的成长历程，他的努力，他的坚毅，他前行的脚步声，他走向地平线的背影。功夫不负有志者，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早在十年前，他的《十国科举制度考略》一文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重量级刊物《文史》上发表，以资料征引的详博、考辨的精细、语言的凝练而赢得学界同仁的普遍赞誉与认可，崭露头角；今日该书因获得资助而即将出版，可谓更上层楼。

该书稿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而其博士论文则又是在其硕士论文《科举制度与十国士阶层》的框架上扩充而成的。屈指算来，从作者入读研究生开始接触科举与士阶层的研究，到本书稿的出版，不觉已有十四个年头了。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秀宏此书庶几近之。十余年来，秀宏始终围绕着“科举与士阶层”问题展开研究，心无旁骛，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亦可谓学而有恒者矣。

秀宏是一个颇有文化关怀的人，他常称自己是一个“中和主义者”。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扩展研究范围，他颇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他苦苦思索和热切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发展方向与未来命运，这无疑是未来几个世纪中国学者必须直接面对和着力思考的核心问题。秀宏以《中庸》的“致中和”为思想原点，以《大易》为根本经典，以之统摄中外一切学术，而以“新中学”的建构为依归，努力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做平常人，为不平常事”，这是十六年前秀宏本科毕业时我送给他的赠语。光阴荏苒，岁月悠悠，当时的情景却历历如在昨日，今重书此语，愿与秀宏共勉。

在书稿获得出版资助即将出版之际，秀宏索序于我，作为他的老师，以我对他的了解，拉杂写了上面的文字，聊以为序。

徐松巍

2012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演变的内容与轨迹	(11)
第一节 科目的系统、类型及沿革	(11)
一、唐科目系统及类型	(12)
二、唐诸科目的设置、沿革与综合类科目地位的提高	(16)
三、五代十国的科目设置	(21)
四、北宋时期科目设置的变化与调整	(23)
第二节 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化	(24)
一、隋唐	(24)
二、五代	(36)
三、两宋	(37)
第三节 糊名、誊录与殿试、覆试	(44)
一、糊名与誊录	(44)
二、覆试制度与殿试起源	(48)
第四节 特奏名、录取名额的变动与地域调整	(65)
一、特奏名	(65)
二、录取名额的变动	(71)
三、进士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	(75)
第二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政治体制的演进	(87)
第一节 科举制度：唐宋时期士阶层与专制政治的合流	(87)

一、科举制度实行前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脉络	(87)
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专制政治利用科举对士阶层的笼络 ..	(90)
三、士人群体组织的消解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95)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皇权—士大夫”体制的建立与危机	(105)
一、“皇权—士大夫”体制的建立	(105)
二、科举制的弊端与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112)
三、唐宋党争与科举	(121)
第三节 唐宋士阶层政治社会地位的升降及代价	(129)
一、科举制度：士阶层地位的升与降	(129)
二、求贤与廉士：唐宋君臣对科举制功能及其局限的反思	(137)
第三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结构的变动	(147)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完备	(148)
一、隋唐之际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动与科举制度的产生	(148)
二、科举制度下唐代士庶的合流趋势	(150)
三、宋代的科举变革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大变动	(157)
第二节 世族的衰落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分散化	(160)
一、世族的延续与唐代科举的过渡性特征	(160)
二、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分散化与宋代科举的制度化	(167)
第四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学校教育的兴衰	(176)
第一节 科举制度与唐宋官学教育的兴盛与危机	(177)
一、隋及唐代前期官学教育的繁荣及其与科举的关系	(178)
二、唐代后期官学的衰落与科举的发展	(182)
三、五代十国时期官学的衰落及其与科举的关系	(186)
四、北宋官学与科举的冲突与协调	(193)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唐宋私学教育的关系	(201)
一、私学的传统与科举对私学的接纳	(201)
二、科举考试内容与私学教育内容的关系	(203)
三、童子科与唐宋时期的童蒙教育	(211)
第五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	(217)
第一节 大一统政治下的官员选拔与儒家学术的发展	(217)
一、从“独尊儒术”到“科举取士”	(218)
二、从《五经正义》到印本九经：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	

与儒家经典的关系	(222)
三、《三经新义》：宋代的重文政策与思想控制的进一步加强	(226)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唐宋官员的职业素质	(230)
一、科举考试与唐宋官员的道德水准	(231)
二、科举考试与唐宋官员的知识结构	(234)
三、科举考试与唐宋官员的行政能力	(237)
第六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	(240)
第一节 科举取士的平等化与唐宋士阶层等级意识的普遍化	(240)
一、观念的转变：重门第一门第与官品兼重—重官品	(240)
二、科举士人的贵族意识	(242)
三、“官本位”价值观念的膨胀	(243)
四、科举官僚制下士阶层等级意识的加强	(244)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下士人功利观念的膨胀	(247)
一、科举劝学与学风的普遍功利化	(248)
二、禄蠹人格与士风的鄙俗化	(255)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下唐宋士阶层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动	(258)
一、从“尚贵胄”到“尚冠盖”：士庶差别的消失与婚姻观念的变动	(258)
二、“榜下择婿”与唐宋士人婚姻关系的变动	(262)
附 录	(270)
附表一 唐宋进士科考试内容变化表	(270)
附表二 北宋宰相统计表	(273)
附表三 北宋宰相人数及在位时间统计表	(280)
参考文献	(282)
后 记	(291)

绪论

科举制度是继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重要的举士制度。^① 它萌芽于南北朝后期，创始于隋，形成于唐，中经五

^① 本书所论科举制度是指一种以考试任职为主要内容，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以试艺优劣为主要取舍依据，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的取士选官制度。它只是选举制度中的一种，或者说是选举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与此前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区别。注意：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不属于选举制度的范畴。另外，选举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以及人才的考核等诸方面，它实际是一种人才管理制度。如《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开篇即云：“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而实际上历代《选举志》都是把这四者放在一起论列的，如《新唐书·选举志》、《宋史·选举志》等皆如此，不赘。本书所论“科举制”仅指四者中的“科目”而言，未敢及于其他。另外，举士与选官不同，且在唐代有明显的分途趋势。宁欣曾从以下六个方面总结了唐代举士与选官的不同，即：1. 二者在选官体系中的层次不同；2. 二者的范围与对象不同；3. 二者主考机构、考试程序与内容不同；4. 二者标准、偏重不同；5. 二者结果不同；6. 二者趋势不同（参见宁欣：《唐代选官研究》第一章《举士与选官的分途》，7~8页，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关于考试任职传统的论述，可参见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代十国，完备于两宋，凝定于元明，废除于清末，前后延续一千三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实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举士制度。^① 它于6世纪末7世纪初发源于中国，7至8世纪时东传至日本，^② 10世纪时(958)东传至朝鲜，^③ 11世纪时(1075)南传至越南，^④ 19世纪时西传至欧美，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

由于科举制度的重大影响，作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历来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但仔细分析现有成果，不难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

首先，对制度本身研究多，将制度与社会联系起来做综合研究少。实际上制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制度，无论是它的产生、发展还是消亡，都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紧密相连。这种关系犹如鱼与水的关系，水中观鱼，则得鱼

① 刘海峰先生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关键场域。”[《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4)]李世愉先生认为：“1300年间，科举制度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之广，影响之深，超过任何一项典章制度。它不但决定应举者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家族的兴衰，而且还左右着当时的教育，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以及社会心态。”(《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前言》，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② 公元7—8世纪，日本曾仿唐制，实行贡举制度。其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但考生多为官僚子弟，较少平民色彩。10世纪后，贡举基本上为贵族子弟所垄断，11世纪时此制因不适合日本的国情而已完全异化了。

③ 936年，高丽统一了朝鲜半岛，958年即仿唐制创立了高丽朝的科举制度，其科目主要有制述业(进士科)、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1392年，李朝取代高丽，仍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逐渐增加本国特色。至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科举制度最后停废，前后实行936年。

④ 越南李朝自1075年起即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至1314年，陈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到黎朝时，仿明制，科举出现兴盛局面，前后开科取士近2万人。至1919年，最后停止科举，前后实行了800余年。

之实态，取而出之，则将窒息难存。^①因此制度史的研究不应仅是文本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实际运作中的鲜活研究。

其次，对唐代或宋代科举分别进行研究的成果多，将唐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研究者少。科举制由唐而宋嬗变的过程及其动因到底怎样，许多事实、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再次，虽然科举制度是与士阶层直接相关的一种制度，但把士阶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系统研究科举制度对士阶层影响的论著并不多见。联系制度嬗变本身的社会背景，研究这种嬗变对士阶层的影响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由以上三点偏向可知：唐宋之际科举制度的嬗变与士阶层关系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唐宋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学者论曰：“经唐宋两代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备的科举制度，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公开竞争、机会均等，为文官制度的健全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在选拔人才上起了良好的作用。唐宋时代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文化人才，不能不说同这种比较成熟、公正的选官制度有关。科举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制度，唐宋时代建立了最完整的文官制度，

^① 近年来邓小南教授倡导“活”的制度史的研究，很有见地。她强调：（1）制度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即一种“眼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历史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2）作为“过程”的制度史研究，即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认为“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3）作为“关系”的制度史研究，她认为，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他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定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种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只有正确地处理这种内外关系，才有可能将制度置于活动的场景之中，才有可能提炼出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才有可能走向对制度史的立体研究。将制度与社会氛围、文化环境和思想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貌似抽象的制度“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加以认识，赋予制度史研究以应有的蓬勃生命力。参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文载包伟民：《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10～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是中国封建社会成熟的标志。这一封建制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进步的。”^①

二

科举制度对中国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影响长久而深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从这一制度形成的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贯穿了整个科举时代。但科举时代的人们为完善这一制度所做的努力，与其说是一种学术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行为。真正把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则始于走出科举时代的 20 世纪以来的学者。据本人不完全统计，自科举制度废除至今百余年的时间里，有关科举的各类研究文章逾千篇，有关科举的通史及断代研究著述近 70 部。其中，隋唐与两宋由于在整个科举史上处于形成与完备的重要阶段而备受关注，研究成果颇丰。除去总论性的文章之外，专论隋唐科举的文章近 400 篇，宋近 200 篇，五代十国研究相对薄弱，目前仅见文章三五篇。总论唐宋者不足 20 篇，整个唐宋时期共约 600 余篇，约是辽金元明清时期的两倍，而且各个时期的分布颇不相同：

年 代	唐	宋	唐宋
20	2	0	0
30	3	3	0
40	12	4	0
50	19	2	0
60	10	12	1
70	20	6	3
80	44	34	1
90	61	37	2
2000—2011	183	71	8

^① 刘修明、夏禹龙：《中国古代文官体制的现代启示》，载《新华文摘》，2000(4)。摘自《齐鲁学刊》，1999(6)。侯绍文先生亦认为唐宋两代考试制度非常重要，“盖唐代对考试之贡献，在自由独立创作之精神，宋代对考试之贡献，在公允慎密完善之方法。中国考试制度，得此两朝代之创制孕育，其规模矩矱，固已卓然树立矣。后之元、明、清三朝代，考试制度，不过继承唐、宋之遗规，踵事增华，并无重大改变。凡研究中国考试制度者，得此两代之记叙成果，自亦可知其涯略也。”（《唐宋考试制度史·自序》）

从以上略表中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研究虽从20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但高潮则出现在80年代以后，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此前60余年的3倍。另外，唐宋比较，唐代科举研究成果的数量约是宋代的2倍。另外，把唐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比较少，仅占唐宋时期总数的1/30，而且主要分布在1990年以后，其中，台湾侯绍文先生编著的《唐宋考试制度史》^①一书，全书分导论、本论、各论、附论等4编总论唐宋时期的考试制度，尤其难得。另有金滢坤先生的专著《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②亦与唐宋科举研究直接相关，其单篇论文《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③对唐德宗至后周恭帝共180年304名宰相的出身、籍贯、科第情况进行了分期研究和动态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值得参考。

由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我们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详尽介绍每一个方面。纵观百年来的唐宋科举制度史研究，可以约略看出如下的发展趋向：

(1)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以考证、梳理制度本身为主。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对科举历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了。早在1925年，东川德治即在《东洋文化》第十二期发表《科举制》一文。1927年，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唐代的进士》一文，接着又于1929年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唐之考试制度与诗赋》一文。此后中国学者陈东原的《隋唐的科举制》^④、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⑤等文相继问世。此时期虽亦有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与社会流动》^⑥、王亚南《支持官僚制度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⑦等论述科举制作用的重要论文出现，但总体而言，以制度本身的梳理为主，理论深度不够，反映了研究初期的特点。

(2)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研究进入繁荣期，不仅成果数量骤增，而且研究的领域和视角都有很大的改变。从研究的领域看，扩展到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教育、文化、西方文官制度以及当代中国的公务员

①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 《中国史研究》，2003(1)。

④ 《学风》，1932(8)。

⑤ 《史学年报》，1934(1)。

⑥ 《社会科学》(清华)，1947(10)。研究的重点是清代。

⑦ 《时与文》，1947(14)。

制度等；从研究的视角看，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成为科举制研究的重要参照，改变了以往就制度谈制度的狭窄视野，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此时期出现了一批在科举研究方面用力较多而卓有成就的学者，如吴宗国、刘海峰、何忠礼、贾志扬等。《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是吴宗国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该书从科举制度的产生、唐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科举在唐代选官中的地位、科举与唐代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是此时期的重要论著。刘海峰先生发表了多篇有关科举的文章，重要的有：《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①、《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②等。专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被认为是“科举学”的新开拓。何忠礼先生以宋代科举研究而著称。他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③认定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其《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④及《论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⑤两文论述了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是此方面的重要论文。贾志扬先生(John Chaffee)的《宋代科举》一书，利用了大量地方志，研究宋代科举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引据详博，众多的图表尤具特色，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科举问题的代表性著作。

总括此时期的科举史研究，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引人注目：

(一) 科举制度的创始时间及其特征

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是科举史研究中争议最久、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有过一场争论，至今亦未平息。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始时间，概括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观点：(1)始隋说。这是占统治地位的一种说法，在国内外史学界基本上已成定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将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它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此说又可细分为始于开皇、大业两种。(2)始唐说。代表人物是何忠礼先生。其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金净先生在其《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亦持相同观点。(3)南北朝后期萌芽说。唐长孺先生在其

① 《历史研究》，2000(6)。

② 《厦门大学学报》，2000(4)。

③ 《历史研究》，1983(2)。

④ 《历史研究》，1990(5)。

⑤ 《中国史研究》，1991(2)。

《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①一文中提出此说，万绳楠先生则明确称科举制度始于梁朝^②。(4)汉代初创说。徐连达、楼劲合撰《汉唐科举异同论》^③一文称，汉唐科举“基本上一以贯之而无本质的不同”，这是将汉代察举与唐代科举混为一谈的一种新说，而两代选举制度实不相同。

围绕科举制确立时间与标志的讨论，实际上关系到科举制的性质、选举制度的继承性与开创性的关系问题。造成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对“科举”界定的标准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分科举人”就是科举，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另有学者认为科举就是考试，汉代的察举也有考试，故认为汉代已有科举。考试虽是科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它并不足以将科举与其他考试制度分别开来。另外，中央举行、定期、分科等都不足以概括科举制的特点。科举制的三大特点是：(1)“怀牒自列”，即自由报考；(2)“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考试成绩具有决定意义；(3)进士科是主干科目甚至是唯一的科目。其二，诸说用语的模糊。如：肇基、初创、确立、创立、正式创立、起于、源于、形成、成于、开始、始于、确定于、萌芽于、正式形成等，多含混而不清晰。其三，标志性起点与绝对性起点。科举中的许多科目在隋以前都有，只有进士科创始于隋并成为以后科举选士的最主要科目，将其作为科举制产生的标志性起点是合适的，但它并非绝对性起点。科举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足以说明科举制度的产生。综上所述，一种新制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它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研究科举制度的产生不能离开它的社会背景。

(二)唐宋科举异同之比较

隋唐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两宋是科举制度的完备期。唐宋两代的科举制研究历来备受重视，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宋代科举与唐代相比，至少有以下25个方面的不同应引起注意：正式确立殿试制度；废除殿试黜落制；禁止结成座主与门生关系；严格控制主考官的权力；废公卷及行卷；禁止公荐；登第即释褐授官；特奏名；扩大取士名额；糊名法；弥封制；誊录法；确立三岁一贡制；禁止举烛夜试；锁院制；锁厅试；教官试；换资试；召试；废除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进士科废除诗赋，改用经义、策、论取士；门第限制的松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24~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②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23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③ 《历史研究》，1990(5)。

弛；以及力图以三舍生代替乡贡进士、进士试法律、别头试等。

唐宋科举的这种变化反映的是唐宋社会的变化，具体地讲就是：由唐而宋中央集权逐步得到加强，并向君主集权过渡；考试制度更完善，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更明显；儒学开始复兴，考试中儒家经典的分量逐渐加重，文学性考察退居次要地位；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门阀社会终结，官僚集团的构成发生变化，科举为更多的下层士人提供了入仕机会；社会更趋于务实。

（三）北宋的科举改革及其阶段

北宋的科举改革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宋初三朝，此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严格科举制度，改革考试程序，提倡公平竞争，杜绝科场弊端，君主逐渐控制取士权。第二个阶段自仁宗朝以后。此阶段的重点是改革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纠正“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以选拔务实有用的人才。^① 此阶段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中的科举改革尤其引人注目。“庆历新政”在大兴学校的同时，加强“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熙宁变法”时期的科举改革历来是研究的热点，中外学者都肯定王安石罢废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废除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士，实行三舍法等，但对王安石以《三经新义》来统一思想的做法则褒贬不一。^② 而北宋后期科举制的变动皆是“熙宁变法”中科举制内容的反复和延续。

第三个问题的研究实质上与第二个问题是切实相关的，因此毋宁说是第二个问题的延续与深入。

三

研究视角的选择往往决定一个研究主题的整体特色。科举制度关涉的社会层面固然很多，但主体层面无疑是士阶层。此处之所以说是“士阶层”而不说“士大夫阶层”，是基于对“士”与“士大夫”相分别的考虑。“士大夫”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阶层，其组成者的身份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士，另一方面又是官僚或官员，而在我的理解中，“士大夫”的含义更倾向于后者，强调一种社会身份或地位，而“士”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功能，或者说是指较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科举制度而言，它是从“士”中选“士大夫”，或者说是

^①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0(5)。

^② 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6)。

从“士”中选“官”，中第之前为“士”，中第并入仕以后方为“士大夫”。尽管无论是在政治创制方面，还是在文化创造方面，“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主导地位，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不管科举录取的人数怎样增加，落第的士人永远比中第的士人多。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未中第的“士”才是整个士阶层的主体，而“士大夫”仅是整个士阶层中的一小部分。而相对于已中第的“士大夫”来说，未中第的“士”与科举的联系更为紧密，或者说科举考试的成败对尚未中第的士阶层的命运影响更大。因此，本人认为，欲考察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影响，与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已第的“士大夫”，不如放在未第的“士”更为妥当。因此，本书的研究主体定在“士阶层”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正是根据以上的认识来确定的。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把研究的主体放在士阶层，强调其知识文化特征，并以之为立足点，从而在考察科举制度对士阶层的影响时，所看到的负面影响多一些，同时批判反思的地方也相对较多，这不是作者的有意偏颇，而是研究主体选定后的必然结果。这是需要在论述之前首先予以说明的。

本书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以制度(科举)为切入点，研究制度与社会(社会群体——士阶层)的切实关联。宁欣在其《唐代选官研究·自序》中认为：“选官体制是相对静态的制度，它以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管理职能的水平，又有社会价值取向、学术思潮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相对静态而又不断演变的选举体制制约下，选举对象的主体——士，作为活的动态群体，经历了一个逐渐异化的过程，包括心态的异化、社会角色的异化、社会职能的异化、人格的异化、文化价值取向的异化。这种异化分别通过自身与外界氛围得到直接体现与间接折射。将静态的制度与动态的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今后的必然方向。”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精到的论述。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最主要的一种选士、任官制度，由于它与士阶层的前途、命运直接相关，大多数士人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所谓“科举生涯”。同时，由于士是传统文化及其承载物——文献典籍的主要创造者与传承者，因此，科举与士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留下的痕迹可以说无处不在，有关科举的文献也非常之多，以至于有人说“中国几乎无一本书与科举无关”。基于科举史料繁多的事实，本书拟将研究范围限定在隋唐五代及北宋，不包括辽、金，除某些情况外，一般亦不论及南宋。之所以这样限定，是因为南宋仅为半壁江山，北有金朝与之对峙，欲论当时科举，舍金则难得其全，取金则非笔者力所能及，反复权衡而取其易，只取北宋为论述范围的下限，意在当时九